

## 阿尔哈米亚语文学


宗笑飞

**内容提要:** 1878年,西班牙著名学者埃德华多·萨维德拉在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展示了一系列阿尔哈米亚语手稿影印件。在此之前,这些手稿一直鲜为人知,它们默默地躺在图书馆的“未知文献”袋中,沉睡了两个多世纪。它们便是滞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及其改宗者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西班牙语文献,被誉为西班牙文学的“新大陆”。本文旨在揭示其来龙去脉。

**关键词:** 阿尔哈米亚语 文献 文学

**中图分类号:** I5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430/j.cnki.fl.2015.03.006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5)03-0038-07

15、16世纪,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他们通常被称为“Mudejares”)及其改宗者(Moriscos)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西班牙语等罗曼斯语,记叙其文化传统和生活境况。“Mudejares”一词源自阿拉伯语,意为“庸常”、“下层”;而“Moriscos”一词则由摩尔(Moro)转化而来。他们使用的这种混合语言被称为阿尔哈米亚语(Aljamiado),它来源于阿拉伯词 , 意为“非阿拉伯语”。虽然它的大量使用是在15、16世纪,但早在公元10世纪,许多阿拉伯、犹太文人缀在一些“彩诗”(muwashshaha)之后的缀诗“哈尔恰”便启用了这种文字,尽管为数不多。这些阿尔哈米亚语手稿,一直被历史的尘埃掩埋,直至1878年,著名学者萨维德拉(Eduardo Saavedra)在其就任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的演说中炫示了有关文献,

并就它们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辨析。

萨维德拉于1889年公开发表这些信息时,还增加了托莱多阿尔莫纳西德和马德里国家图书馆发现的阿尔哈米亚语藏品。但是,这些信息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直至1948年学者卡尔德隆(Serafín Calderón)将这些文献形容为西班牙文学的“新大陆”,以及1958年牛津大学的哈维(L. P. Harvey)在博士论文中对阿尔哈米亚语文学进行钩沉探赜。

哈维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了战后由西班牙国家高科委收集的有关文献影印件和在萨拉戈萨发现的新的文献信息。他所给出的散落在西班牙和英、法图书馆的阿尔哈米亚语文献数量为114份,不包括那些用阿尔哈米亚语标注的阿拉伯语文献。

1988年,切恩(Anwar G. Chejne)对已

知阿尔哈米亚语文献进行了历史性梳理,与此同时,罗德里格斯(Antonio Vespertino Rodríguez)又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分门别类。这时,阿尔哈米亚语文献的数量已增加至221份。1998,洛佩斯-莫里亚斯(Consuelo López-Morillas)又在维斯佩尔蒂诺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增加了新的发现,使文献数量增加到了235份。与此同时,西班牙学者富恩特斯(Alvaro Galmés de Fuentes)和卡纳尔(Casassas Canals)等对同时期穆斯林及其改宗者的拉丁文和拉丁俗语文献进行了梳理。

除却由宗教裁判所等官方机构归类并包收藏于马德里国家图书馆那些夹杂在阿拉伯语资料中的阿尔哈米亚语文献外,绝大多数阿尔哈米亚语文献来自非常偶然的发现。它们大都被有意藏匿于私人宅第,显而易见是西班牙穆斯林在被迫改宗后书写的。迄今为止,最早的一次发现是在1719年,人们在萨拉戈萨的一座住宅中发现了一批内容不详的“阿拉伯语”手稿。它们被藏在宅第的石柱之上,瓦和良好的防水处理使它们完好无损。用孔德(José Antonio Conde)的话说,“时间会发现一切。……在这些隐藏的手稿中,破天荒地出现了改宗者的文学。”(Roca:27—42)孔德将这些“破天荒”发现的文献献给了马德里国家图书馆的前身西班牙皇家图书馆,并声称“在萨拉戈萨没人能读懂这些作品”。(36)遗憾的是除了孔德致皇家图书馆的信笺,时人对有关手稿一无所知。倒是莫拉雷斯(Justo García Morales)发表于1966年的一篇短文援引了18世纪皇家图书馆管理员伊里亚特(Juan de Iriarte)对其中一份手稿的编者按:“此书佚名,无创作时间,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的卡斯蒂利亚语写成,为穆罕默德信徒的道德说教。最后是每周七天的祷告内容以及每年月历和戒斋、朝觐时间……”(49—50)这是来自马德里西

班牙国家图书馆的第5354号手稿。这些组成了萨维德拉公布的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51份阿尔哈米亚语手稿,却并不包括1887年图书馆从私人藏家手中购买的阿雷瓦罗(Mancebo de Arévalo,亦即阿雷瓦罗的年轻人)的手稿(国家图书馆第4987号)。

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的是皇家历史学院馆藏,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改宗者的拉丁文献;第二部分才是阿尔哈米亚语文献,凡18卷;第三部分为散片和残编。它们是私人收藏家加央戈斯(Pascual Gayangos)于1896年转让给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的。1998年,富恩特斯根据萨维德拉的分类对其进行了整理。至于1841年在伦敦拍卖的阿尔哈米亚语手稿,部分出自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亦为皇家图书馆),部分出自马德里皇家图书馆,它们都是孔德从萨拉戈萨收集的。在加央戈斯转让给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的手稿中就有伦敦拍卖会的拍品。

除此而外,西班牙国家高科委(CSIC)人文社会科学中心藏有希尔(Pablo Gil y Gil)1884年从萨拉戈萨获得的阿尔哈米亚语文献。这些文献是在萨拉戈萨一座古宅的地板夹层中发现的,保存完好。遗憾的是负责古宅修缮的工人将其弃于垃圾堆中,被玩耍的孩子毁坏殆尽,仅少数残存的被希尔抢救并保存下来。1910年,在阿辛·帕拉西奥斯等人的敦促下,马德里学术促进委员会买下了希尔手中的这些手稿。

以上是大部分阿尔哈米亚语手稿的来历与所在,其他出于西班牙各地的阿尔哈米亚语文献或残编散落于西班牙皇宫图书馆、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图书馆(托莱多)、昆卡档案馆、伊西多尔·德·拉斯·卡希加斯私人藏馆、奥卡尼亚藏馆(托莱多)、萨拉戈萨皮拉尔大教堂档案部、萨拉戈萨皮亚斯学校图书馆、萨拉戈萨大学图书馆、萨拉戈萨公证处档案

馆、萨拉戈萨阿拉贡法院档案馆、阿拉贡博物馆、加泰罗尼亚图书馆(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巴塞罗那城市历史档案馆、莱伊达研究所、莱伊达公共图书馆、塔拉戈纳阿斯科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普罗旺斯梅冉纳图书馆、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阿尔及尔国家图书馆、悉尼大学图书馆、墨西哥中央档案馆、卡塔尔国家图书馆,等等。

近年,《阿尔哈米亚》(*Aljamía*)杂志承担了整理和研究阿尔哈米亚语文献的任务。该刊自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以来,发表、结集了大量有关阿尔哈米亚语文献的资料和信息。同时,波多黎各大学的洛佩斯-巴拉尔特(Luce López-Baralt)教授对有关文献的文学元素进行了耙梳。

## —

在进入阿尔哈米亚语文学之前,有一个历史背景必须予以宣达,否则人们将难以理解这一书写方式的产生与留传。

首先是14世纪至15世纪的大屠杀和大驱逐。最初是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迫害。1391年前后,史称“残忍者”(或“勇敢者”)彼得的佩德罗一世(Pedro I, “El Bravo”)与同父异母的恩里克二世(Enrique II, 史称亨利二世)争夺王位,其间发生了一场内战,双方分别得到了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但战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不仅仅是政权更迭,而且双方“莫名其妙”地将危机转嫁给了掌握着商业和经济命脉的犹太人。这便是1391年耸人听闻的反犹、排犹和犹太人大屠杀的真正原因。是年6月,大屠杀肇始于“光复”不久的塞维利亚,并迅速蔓延至托莱多、瓦伦西亚、巴塞罗那等地。杀戮持续了近半年,在伊比利亚半岛创造了西法底文化的犹太人及其后裔不是惨遭杀害,

便是被迫改宗或逃离家园。许多犹太教堂一夜之间被改造成了天主教堂。然而,即或犹太改宗者出入公共场所时,也必须忍受屈辱、佩带明显的标识——黄色百合。关键是这样的惨剧并未就此终结。随着基督徒“光复战争”的节节胜利,那些侥幸逃至科尔多瓦、格拉纳达等穆斯林占领区的犹太人仍然不能摆脱愈来愈残忍的阴谋和阳为。自1449年至1491年,各种大大小小的迫害和杀戮从未停止。及至1491年,令人发指的“托莱多事件”爆发,该事件又被称作“瓜尔迪亚圣婴事件”。瓜尔迪亚(Guardia)原是托莱多附近的一个小镇,而“瓜尔迪亚”有守卫之意。托莱多的基督徒们精心策划了一起“犹太人虐杀基督徒婴儿事件”,从而再次大兴杀戮和迫害之风。这样的悲剧一直由宗教裁判所延续到16世纪。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后,滞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他们不是被迫改宗,便是被驱逐。然而,改宗的最大代价便是放弃一切过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这正是少数被迫改宗却心存幻想的穆斯林后裔创造阿尔哈米亚语的历史原因。也正因如此,西班牙当局终于在1570年和1609年再度掀起两次大规模驱逐“莫里斯科”(穆斯林改宗者及其后裔)的高潮。

其次,阿尔哈米亚语文献大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它们包罗万象,但大抵围绕着抓住文化认同的最后一根稻草——语言和信仰——这一宗旨。于是,大批西班牙穆斯林不仅一直被西方轻蔑地称作摩尔人(他们甚至进入了莎士比亚等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而且也曾作为廉价悲悯的素材——“理想的化身”,出现在“黄金世纪”西班牙作家的笔下。后者大多被指拥有闪族血统:譬如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德莱昂修士(Fray Luis de León)、圣特雷莎(Santa Teresa de Jesús)、维韦斯(Juan Luis

Vives)、巴尔德斯兄弟 (los hermanos Valdés)、阿莱曼 (Mateo Alemán), 等等, 甚至还有塞万提斯。

在洛佩斯-巴拉尔特看来,《堂吉珂德》便是以描写主人公的食谱开篇的:堂吉珂德——当然也指塞万提斯——生活在一个痴迷于“污秽食物”的国度。洛佩斯-巴拉尔特提醒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对这一文学瑰宝进行准确而充分的解读。但是如果如果没有深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底蕴,我们是无法感知个中奥秘的。在洛佩斯-巴拉尔特看来,这种痴迷会使人立刻意识到西班牙人(堂吉珂德)的闪族特征。而塞万提斯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堂吉珂德吃着煎腌肉摊鸡蛋 (duelos y quebrantos, 字面意思为“悲苦与破碎”),心有灵犀的读者便会明白,这是一种戏谑:暗喻堂吉珂德新近改宗(从伊斯兰教被迫改信天主教),因为“duelos y quebrantos”是改宗者们给火腿和鸡蛋所起的别名,对于新基督徒来说,这食物确实实难以下咽。在西班牙,牲畜的头、尾、爪、心及肝肠内脏等也统称为“duelos y quebrantos”(转意为“杂碎”)。但在拉·曼却地区,它却专指煎腌肉摊鸡蛋。因为腌肉火腿是猪肉,所以对于穆斯林或改宗者而言,吃这道菜不啻为悲苦。此外,乡下人(老基督徒)桑丘·潘沙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叨着他的“老基督教徒七指厚肥膘”,自嘲地把自己的臃肿比作猪猡,这对改宗者而言,也是十分恶心的。洛佩斯-巴拉尔特还提醒我们留意塞万提斯的另一个戏谑式暗喻:堂吉珂德,这位聪明睿智、异想天开、行为叛逆的人,首先是位好读者,他的诸多言行都体现了改宗者的特征。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盲桑丘·潘沙却是“纯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们的血液中没有掺杂一滴异族血液。此外,人物洛伦索 (Aldonza Lorenzo) 的出现也颇为有趣:这位摩尔人翻译了哈梅特·贝南

赫里的阿拉伯语手稿——即《堂吉珂德》,他在读到“这位杜尔西内娅·德·托波索是拉·曼却腌猪肉的第一把好手”时,不禁哈哈大笑。如果不是洛佩斯-巴拉尔特稍作解释,我们便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可笑之处。首先,她使我们明白,杜尔西内娅是摩尔镇的杜尔西内娅,或“摩尔人杜尔西内娅”。这是隐藏在这个名字背后的信息。更妙的是,杜尔西内娅还会做腌猪肉,这是她竭力扮演基督徒以掩盖自己受人轻视的摩尔血统的有力证据。唯其如此,那个翻译了《堂吉珂德》的摩尔人当然也是改宗了的,否则无法继续在西班牙安身立命,但他必须是隐藏得很深的穆斯林,否则不会精通阿拉伯语,也不会有能力将《堂吉珂德》从阿拉伯语译出。当时,这种语言在西班牙被禁数十年载。如此会心的大笑(或许还掺杂着些许苦涩)应该是因为同病相怜。他一定是在杜尔西内娅的表演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毋庸讳言,他一定也是在自嘲,同时嘲笑那个社会。适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白色恐怖肆虐,“塞万提斯堪称最为勇敢而敏锐的作家之一”,其丰富性、深刻性由此可见一斑。(洛佩斯-巴拉尔特:34—35)

当然,为了生存,犹太人和穆斯林不得已改信基督教,但他们并未完全屈服于压迫者的宗教和文化。前面介绍的大量阿尔哈米亚语文献证明了这一点。学者科尔梅 (Fidel Fita y Colmé) 在《西班牙犹太人:历史纪实》(La España hebrea, datos históricos) 一书中记载了 1501 至 1526 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它们明令禁止一切异教活动,稍后连阿拉伯语也被禁用了。阿尔哈米亚语文献便大都创作于此后的二三十年间。在政教合一的西班牙当局强迫他们同化时,一些穆斯林开始启用由来已久的阿尔哈米亚语,它不仅使不懂阿拉伯语的基督徒无法辨识,就连不懂西班牙语的穆斯林也难以解读。只有那些通晓两种语言的人

才能理解这种文字。诚然,因为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有关文献的创作者仍不得不“转入地下”,而那些侥幸流传下来的作品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密电码”。

## 二

1948年,西班牙学者卡尔德隆将阿尔哈米亚语文献比作新大陆,“它是西班牙文学的新大陆,几乎完全被岁月埋没。它的现身犹如哥伦布发现美洲,人们无不被它的丰饶所慑服。”(Calderón:22)然而,事实并不像卡尔德隆预计的那么乐观。迄今为止,这些文献所传递的大抵是较为宽泛的文化内容,只有极少数篇什具有文学价值,尽管不少学者仍寄希望于更多的发现。用哈维的话说,“梅嫩德斯·佩拉约的假设至今有效……:发掘工作尚未收到预期的效果。”(Pelayo:6)

洛佩斯-巴拉尔特钩沉索隐,从所能掌握的阿尔哈米亚语文献中梳理出极具文学和历史价值的手稿。沿着她的思路,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对这些手稿作了进一步整理与分析,这些成果大多刊登在《阿尔哈米亚》杂志上,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内容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古兰经》再叙述、再阐释。这部分手稿内容通常是《古兰经》部分章节的拉长和转述。15、16世纪,西班牙当局明令禁止使用阿拉伯语,导致西班牙境内的阿拉伯语急速衰退,以至于阿拉伯后裔已无法准确地诵读《古兰经》。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地下穆斯林(Crypto-Muslims)使用阿尔哈米亚语来转述《古兰经》的内容,以期保存这一神圣的宗教经典。在洛佩斯-巴拉尔特看来,最重要的几份手稿出自阿雷瓦罗之手。后者据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文,并熟练掌握卡斯蒂利亚语”。(Arévalo:88r-89v)他在作品中指出,伊斯

兰文化正在西班牙无可奈何地衰亡,因此必须拼力抢救。他说自己的同胞已经渐渐忘却了阿拉伯语,对伟大的《古兰经》更是浑然不知。于是,这位阿尔哈米亚作者给他们上了一课:

我想选择一些与阿拉伯语相关的阿尔哈米亚语来指点他们,因为许多同胞总是问我:为什么在阿拉伯语中有时说allah<sup>①</sup>,有时又说allahu,甚至还有allahi……要知道,没有任何后缀的allah是一种绝对形态;allahu则是一种相对形态……比如说可怜可怜吧。说allāh的人,便是渴望将自己交付给安拉的人;他会直接抵达安拉身边,而不是寻求他的怜悯。因此,那些说allahu的人,却是在寻求怜悯,他们通往真主的道路会比较漫长。(洛佩斯-巴拉尔特:156)

他还对他们说,字母'alif(ا)、bā'(ب)及jīm(ج)是阿尔哈米亚语的“元音”(当然,除了'alif,另外两个字母已算不得元音,即使在阿拉伯语里它们也不是元音):“阿尔哈米亚语的元音字母有alif、bā和jīm,如果没有这三个字母,便无法构成阿尔哈米亚语。所有其他字母都是辅音……”(洛佩斯-巴拉尔特:156)

而巴勒塔(Vincent Barletta)在其文章《〈古兰经〉的拉长——阿尔哈米亚语叙事:关于易司马仪献祭的圣训》中,则以皇家历史学院的ms.11/9409和洪达图书馆的ms.25这两份手稿为例,对其叙述手法进行了分析。这两份手稿讲述的是易司马仪(Ismail,易卜拉欣之子,亦即《圣经》中的以实玛利)受梦境启示,决定向真主献祭自己最心爱儿子的典故。它与《古兰经》第37章101节至113节的内容完全相同,但叙述方式有别。它们显然有所铺张。在手稿中,梦境延续了四个晚上:易卜拉欣在第一晚接受梦境启示后,为真主献祭了一匹骆驼。

<sup>①</sup> 在西班牙语中,allá意味着那里,可引申为“彼岸”,甚至“天堂”等。

但到了第二晚,使者仍然在梦境中降示,要求他继续献祭,他于是献祭了一头牛。第三晚,梦境依旧,他于是又献祭了一只羊,直至第四晚,使者才托梦易卜拉欣,要求他将自己的儿子易司马仪献祭给真主。而在《古兰经》第37章103节:“他俩顺从听命,他便让儿子侧卧在地”,(《古兰经韵译》:815)阿尔哈米亚语手稿版又添加了一段易司马仪与母亲的感人至深的对话:儿子问母亲为什么用枣树叶和樟脑给他洗头,母亲回答说:“这是你父亲的命令。”易司马仪便说:“既然是父命,你就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这段对话明显蕴涵着伦理道德。至于献祭途中易司马仪与魔鬼的对话,也丰富和饱满了许多:魔鬼先后变成老人、鸟和大山,来阻止献祭。而在每次扫除障碍、反驳成功之后,易司马仪又会反复诵念“真主至大”这句箴言。至此,手稿将散乱的故事与反复的诵念糅合到一起。在《古兰经》里,有关内容不过百字,而阿尔哈米亚语手稿则将其扩充到了千余字。这也反映了当时地下穆斯林守护《古兰经》的心志,从而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故事内容更加丰富,其中伦理道德和教化功能不言而喻。

第二类是记述穆斯林亡命天涯的悲惨境遇,及其幻想与憧憬。在洛佩兹-巴拉尔特列举的阿雷瓦罗的手稿中,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字同公元16、17世纪因世俗文化和新教的崛起而退守一隅或“负隅顽抗”的某些天主教僧侣的想象如出一辙。譬如阿雷瓦罗写到自己前往麦加的路上遇到一位穆斯林老妪,老人对他说:

我的孩子,你要坚信——因为《古兰经》正是这样昭示的:哭泣是一切悲剧的诱因,过去的(哭泣者)注定要让今天的(哭泣者)来承受苦难……我还要告诉你,我的孩子,所有人都害怕被抛弃:因为易卜拉欣(Ibrahim,原文如此)害怕,路加(Lut,原文如此)惊惧,雅各(Yacub,原文如此)颤抖,

缪斯(Muça)不安,托比亚(Tobiat)隐忍,于是安拉帮助他们,所罗门和以撒关心他们……(洛佩斯-巴拉尔特:164)

这些手稿除了表达悲愤之心,还以玄妙的手法勾勒了一种希望:认为穆斯林在经历漫长的流放后,终有一日会再次回到伊比利亚半岛,重新统治这个地区,将基督教的统领踩在脚下。

15、16世纪,西班牙基督教当局在驱逐穆斯林以及犹太人的同时,急于抹去这两种文化在半岛的最后一丝痕迹,因而将伊斯兰教视为邪教,下令烧毁《古兰经》等所有伊斯兰教文本。而地下穆斯林便用阿尔哈米亚语创作了大量手稿,以守护传统、诋毁异教。许多人对《圣经》进行了辨正研究,程度之深之广甚至超过其对《古兰经》的认知,堪称基督教神学大家。

查阅西班牙国家高科委上传的所有阿尔哈米亚语手稿的PDF版本,可以发现阿尔哈米亚语的一个共同特点还在于,几乎所有手稿都会开篇援引《古兰经》:“以仁慈的真主之名”(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但恰恰是这句引言,使我们看到了阿拉伯语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急速衰退,盖因它已错误百出。这反倒成了阿尔哈米亚语手稿的语言特征。在此,姑且转引洛佩兹-巴拉尔特所举之例:

普罗旺斯图书馆存放的第1223号手稿的匿名作者(或抄录者)按照语音规则转录了《古兰经》第一章《开端章》的第一节。这节经文对于伊斯兰教而言,犹如基督徒的祷文一样重要。尽管其变体已不那么具有神圣性,但它还是揭示出了这种神圣语言的通俗化趋势。它被辑录于通俗文本之中,在手稿的第一页上赫然写着: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以替换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同样的情形在马德里国家图书馆的第

3236号手稿残篇中也明显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它错误地少了字母ي(y):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以替换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155)

至于第三类,即大量已发现的阿尔哈米亚语诗歌,一般认为较之此前丰富多彩的安达卢斯文学似乎相形见绌,甚至被指“缺乏审美价值”。篇幅所限,本文从略。

总之,就迄今为止已解读的阿尔哈米亚语手稿来看,它的文学性并不是很高,语言简单,叙事形式单一,这也恰恰反映了在大驱逐时期仍然流散在安达卢斯地区的地下穆斯林们文化生活的急速衰退,与一两个世纪前穆斯林文化的辉煌灿烂相映照,更凸显出他们落魄悲惨的境遇。不过,这些手稿的内容质朴,在记述宗教内容的同时,也有一些手稿反映了当时地下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道德伦理,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阿尔哈米亚语一词虽来源于阿拉伯语,意为“非阿拉伯语的”,但它既非纯阿拉伯语文本,亦非纯罗曼斯语文本,而是安达卢斯地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学者必得同时兼懂两种语言,才能对其进行解读,这也为研究带来了重重困难与障碍,许多难题仍亟待破解,研究才可谓刚刚起步。但可以想见,随着东方学在西方的再度兴起,阿尔哈米亚语言文学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将被提上日程,我们将有望全方位地审视这朵带血的奇葩。□

#### 参考文献:

1. Arévalo. *Sumario de la relación y ejercicio spiritual*, Res. 245, Biblioteca Nacional de Madrid, fols. 88r-89v.
2. Barletta, Vincent. "Aljamiado-Morisco Narrative as Qur'anic Amplification: The Alhadith sobre el sacrificio de Ismail." *Mediterranean Studies* 13 (2004),

57-75.

3. Canals, Casassas. "La literatura islámica castellana." *Al-Andalus Magreb, Estudios árabes e islámicos* 16 (2009).
4. Colmé, Fita y. *La España hebrea, datos históricos*. Madrid: Editorial Visor, 1898.
5. Fuentes, Galmés de. *Estudios sobr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aljamiado-morisca*. Madrid: Fundación Ramón Menéndez Pidal, 2004.
6. —. *Los manuscritos aljamiado-moriscos de la Bibliotec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98.
7. Harvey, L.P.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Moriscos 1492-1609*. Oxford: Magdalen College, 1958.
8. —. "El Mancebo de Arévalo y la literatura aljamiada." *Actas Del Coloquio Internacional Sobre Literatura Aljamiada y Moriscas*. Madrid: Editorial Gredos, 1978.
9. —. "Un manuscrito aljamiado de la Biblioteca de la Universidad de Cambridge." *Al-Andalus*, XXIII, 1958.
10. López-Morillas. "Los manuscritos aljamiados." *Al-Qantara*, XIX. Madrid: 1998.
11. Morales, García. "Los empleados de la Biblioteca Real(1729-1836)." *Revista de Archivos, Bibliotecas y Museos*, LXXIII(1966).
12. Pelayo, Menéndez y. *Historia de los heterodoxos españoles*. Madrid: Atlas, 1944.
13. Roca, Pedro. "Noticia de la literature aljamiada: Su descubrimiento." *Revista de Archivos, Bibliotecas y Museos*, X(1904).
14. 《古兰经韵译》,林松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15. 洛佩斯-巴拉尔特:《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宗笑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北京 100732

# FOREIGN LITERATURE

## BI-MONTHLY, NO. 3, 2015

Editor: JIN Li    Associate Editors: JIANG Hong, MA Hailiang

---

### Selected Abstracts

**NING Jing Place and Englishness in Swift's *England and Other Stories* 3**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England and Other Stories* is centered around the theme of place and Englishness. It writes about the traumatic historical memory of violence stored in the English place, so as to deconstruct the green and peaceful English "rural myth" and th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it tells stories about displacements of minority group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order to deconstruct the homogeneous Englishness with the different and diverse English reality. Swift finds in the liminal space the typical geograph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ness and pursues a new sense of belonging for the English people with literary narratives that convey "universal humanism".

**ZHANG Jian Rewriting History and Myth: A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World's Wife* by Carol Ann Duffy**

18

Carol Ann Duffy's *The World's Wife* presents a series of originally silent women, whose existence depends on famous men or male mythical figures: Aesop, Pygmalion, Hermes, Samson Agonist, John the Baptist, Lazarus, Shakespeare, Dr. Faustus, Elvis, and even the big ape from the film *King Kong* and Quasimodo from the film *Notre Dame*. Some of these women are meek, others are shrewd; some are victims and others are perpetrators of violence. In these poems they are not silent, but often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Through their stories, they express their ideas and opinions, subverting prejudices about history, gender and sexual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sound out a post-modern feminist voice.

**YANG Renjing Hemingway and Existentialism 29**

This article traces back to the modern existentialist current that appeared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One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many European and American writers. Ernest Hemingway happened to stay in Paris at that time. As a young journalist, he knew quite well the important European events. He understood and mastere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showed some ideas similar to the existentialists in his fiction, which is striking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isolation and nada, failure and death, escape and rebellion. The article gives a detailed exploration on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aspects based on textual analyses and combined with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and eventually makes some comments on Hemingway's suicide.

**ZONG Xiaofei Aljamiado Literature 38**

In 1878, the famous Spanish scholar Eduardo Saavedra showed some photocopies of Aljamiado manu-



scripts on his 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Spanish Royal Academy. Before that, these manuscripts were kept in the libraries as “Unknown Documents”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These Spanish manuscripts written by Mudejares and Moriscos who lived in Spain are called “Aljamiado Literature”, and are praised as “the new world” of Spanish literatu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veal its history and context.

#### *XU Le Manipulation of Conflicts in Chekhov's Plots* 45

Compared with other Russian authors of realistic classics, Chekhov's construction of plots exhibits an outstanding feature that paradoxically combines the decrease of plot magnitude with the increase of message within narrative units. This makes the uniqueness in Chekhov's manipulation of conflicts within his plots, i.e., to downgrade both emotional outbursts and inward strife between principles, while narrating nonchalantly with a detached and refraining “objectivism” the vehement clashes de facto. When the common weakness between both sides of the clashing parties comes to be identified in narration, their dividing line of standpoints gradually becomes blurred in the context of real life. Hence the absurdity and triviality of the characters' living environments prove finally to be the real origin of human conflicts.

#### *LI Yifeng “New Mestiza Consciousness” in Sandra Cisneros' Caramelo* 53

The border between the U. S. and Mexico makes the borderlands where different cultures meet, clash and collide. American Chicana feminist theorist Gloria Anzaldúa finds out a survival strategy—new mestiza consciousness — for Chicana women, who live on the borderlands. It is a tolerant and non-dichotomic thinking mode. *Caramelo*, written by Sandra Cisneros, embodies Anzaldúa's “new mestiza consciousness”. The protagonist Lala deeply feels the pain of being “halfway between here and the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but she is finally able to cross the “border” of race, culture and class through telling her dead grandmother's story to help her cross the border between life and death. Putting her grandmother's rebozo on her shoulder, Lala realizes and accepts her hybrid identity that blends many cultures and her split self is finally reunited.

#### *LUO Xiaoyun Metamorphosis and Interpretation: Philip Roth's Kepesh Novel Series* 61

The American novelist Philip Roth reveals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postmodern society in his experimental metamorphosis novel *The Breast* and encounters criticism for his fantastic style.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he wrote two novels to interpret his ideas and completed the series which historically display the thinking and changes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unrestful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se novels also mark the turning of Roth's writing style from postmodernism to neo-realism.

#### *XU Bin. The Theme of Escape and Its Politic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in V. S. Naipaul's A Bend in the River* 69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A Bend in the River*, V. S. Naipaul declared that “Africa has no future” in an interview. As a result scholars almost unanimously regard Naipaul as a pessimistic escapist. But the truth is the opposite. Naipaul has indeed described the escape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groups of people living in the heart of postcolonial Afric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aipaul has imbedded rich politic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in his narrative of escapes, through which he has asked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s: “Why does Africa not have a future?” and “In what way can Africa have a future of its own?”